

001

跨入文明的门槛

文明起源

中国文明形成于公元前 2000 年左右 其历史之悠久 内容之广博 形成机制之复杂、生命力之强大为人类史所独有。当今学术界普遍认为，城市、文字、青铜铸造、礼仪性建筑是构成文明的基本标志。中国何地何时最早跨入文明的门槛？中国文明因素的萌生、发展，最终导致文明时代到来的演进历程如何？这是当前人们所关注的一个问题。

现今中国大陆是一个巨大的地理单元。它东邻大海，西有青藏高原；它的北部寒冷而干燥，南部炎热而多瘴疠，中国大陆同外部世界处于一种相对隔离的状态。这也就决定了中国文明的形成过程基本上是一条独立发展的道路。

大约在公元前 5000 年至前 3500 年的新石器时代晚期，中国各地区文化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目前已发现的该时期遗址达 7000 余处 按其分布地域和文化特征大致可划分成 6 个文化区，即辽河流域的燕辽文化区、黄河上游的甘青文化区、黄河中游的中原文化区、黄河下游的山东文化区、长江中游的长江中游文化区、长江下游的江浙文化区。这 6 个文化区好像一朵巨大的花朵，而中原文化区正处在花心的位置。这些文化区是相对稳定的，但又不是封闭的，而是不断相互撞击、相互交流、相互影响的。这一时期的农业已相当发达，人口显著增加，较大型的定居村落到处涌现。此时的聚落一般是凝聚式和向心式的，内部还没有发生明显的分化，由众多小房子所体现的对偶家庭生活没有自营经济，最多是一种半消费单位。此时的墓葬多为多人二次合葬制，随葬器物较少，也没有明显差别，可见当时还没有私有财产。这一时期最令人瞩目的文化现象是彩陶与大量宗教性遗存的出现。此时广泛出现于各大文化区的彩陶既是制陶技

术与绘画技术发展的产物，又是原始宗教发展的产物。这一时期的彩陶纹饰不仅有日、月、山、水、火、云、动物、植物、人物等自然界形象，还出现了抽象的几何图案，有些图案繁缛复杂的程度令人眼花缭乱。像陕西半坡、姜寨仰韶文化遗址出土彩陶盆上的“人面鱼纹”、河南阎村仰韶文化遗址出土瓮棺上的“鹤鱼石斧图”都是包含有宗教观念的图画；山东莒县陵阳河大汶口文化遗址出土灰陶尊上由山、火、日构成的刻划符号，则是在表示在山顶燎祭太阳的宗教仪式。

这一时期最引人瞩目的宗教性遗存是 1987 年在河南濮阳西水坡仰韶文化遗址第 45 号大墓发现蚌塑。其中第一组蚌塑主要位于墓主人尸身两侧，东侧为龙形，西侧为虎形，龙、虎均头北尾朝南呈奋力行走状，第二组蚌塑为人乘龙背，与虎同翔于星空的图案。对于这些蚌塑的内涵与含义，目前学术界还有不同的看法，但蚌塑显然是一种宗教遗存，而其墓主人应该是与这种宗教遗存有密切关系的巫师，同时也是该墓地所代表的氏族或部落的酋长。宏大奇特的葬式反映了墓主人的特殊身份与地位，这种特殊的身份与地位并不是贫富分化、阶级分化的产物，而是宗教发展的产物。也就是说，第 45 号大墓的主人虽然在财富上没有特殊地位，但他是先民的精神领袖，在先民中具有特殊的权威。这种具特殊葬式的“权威人士”的出现，显现了阶级产生的端倪。这也是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重要特征之一。

公元前 3500 年至前 2600 年，是铜石并用时代的早期。考古遗存清楚地表明，这时已出现贫富分化和社会地位的分化，随着私有制的产生，原本平等一体的原始共产制社会从此日趋衰落。

铜石并用时代早期，制铜技术还处在初级阶段，铜器较为稀少；传统的玉器制作技术则获得了突破性的进展，玉质礼器大量出现，其规范与精美程度令人吃惊；制陶技术也有了显著的进步，陶窑有了改进，陶类增多，少数陶器已使用快轮拉坯的方法。生产的发展，产品的丰富，使社会经济出现了少量剩余产品，这使得一部分人通过不等价交换等各种手段榨取他人的剩余劳动成为可能。

这一时期，迈向文明的新因素纷纷出现，有的已有明显的表现。首先是墓葬出现了贫富与地位的差别。如山东文化区大汶口文化后期的大墓，墓坑宽大，有棺有椁，随葬品多达百件以上，其中既有精美的陶、玉、象牙器具，又有象征权力的石、玉、蚌，而小墓则没有葬具，随葬品极少或甚至没有。此时房屋也出现了分化，这种分化在中原文化区仰韶文化后期遗址

中有明显的反映。许多小遗址没有特别讲究的房子，个别大遗址则出现若干特别讲究的大房子。如大地湾遗址，就有好几座用类似水泥的材料建筑的大房子。最大的 901 号房有前堂、后室和两厢，总占地约 420 平方米。这样大的建筑至少是一个中心部落或部落联盟总部的所在地。此时的宗教遗存以大型祭坛的出现为特征。在燕辽文化区辽宁牛河梁红山文化后期遗址中。人们发现了用石头的巨大方形祭坛和圆丘形祭坛，祭坛附近有供奉祭祀神像的半地穴式的庙，庙中的一些神像竟大于真人两倍。祭坛不远处还有十几座规模很大的贵族墓，墓中随葬大量玉器，其中以礼器居多，墓主人当为具有特殊权势和经济地位的巫师兼首长。看来，牛河梁遗址可能是某个占支配地位的部落或部落联盟的首脑所控制的神圣场所。

公元前 2600 年至前 2000 年，是铜石并用时代的晚期，也是文明终于出现的时期。这一时期的社会经济进一步发展，铜器、玉器的产量与工艺水平大幅度提高，纺织、漆木、酿酒、建筑技术也迅速发展起来。生产的发展使财富大量地积累起来，加速了贫富的分化，也刺激了掠夺性战争的发展。这时出现了很多城堡，兵器的种类增多，制作精良，到处出现的乱葬坑则反映了战争的剧烈程度。战争是文明社会的催生婆。作为文明重要标志的城市出现了。考古工作者在山东历城县龙山镇城子崖发现了这一时期的城市遗址。该城内部面积有 20 多万平方米，平面略近方形。建造这样的城不但要有统一的规划，还要组织大量的劳动力才能完成。该城应是某种政治、文化中心的象征，或视为都城的雏形亦无不可。同一时期的城址还见于河南睢阳平粮台、登封王城岗等地，只是城的规模要小一些。动用大量人力构筑的宗教建筑也出现了。像浙江余杭县瑶山良渚文化祭坛，面积约 400 平方米；良渚文化的贵族大墓基本上都安葬在人工堆筑的坟山上，如浙江余杭县反山良渚文化遗址就是一座人工堆筑的坟山。该坟山长约 100 米、宽约 30 米、高约 5 米，在上面开穴埋人后再覆以 1.3~1.4 米厚的封土，总用土量约 2 万立方米，堪称中国的金字塔。可见拥有祭坛与坟山的贵族已出现，他们在宗教、政治、经济、军事诸领域握有巨大的权力，并已有严密组织的统治集团，住地已有宫殿、宗庙等建筑。这一时期墓葬的两极分化进一步加剧。像山东省临朐县西朱封墓地中的三座大墓，其中两座是两椁一棺，1 座是一椁一棺；随葬的陶器、玉器工艺精湛。山西襄汾县陶寺墓地中的墓葬，分为大、中、小三类，这种等级分明的金字塔式结构，正是当时社会阶级分化的生动写照。总起来看，在铜石并用时代晚期，中国大陆各文化区大约都已走近文明社会的门槛，有的甚至已迈入早期文

明社会。

大约公元前 2000 年的时期，情况发生了突变。处于社会发展前列的山东文化区的山东龙山文化和江浙文化区的良渚文化突然衰落了。有学者指出，造成这一突变的原因是突发的洪水。史籍中对相当于这一时期的尧、舜、禹时的洪水多有记载。在特大洪水泛滥之际，江河的下游必是重灾区，山东龙山文化、良渚文化的原有的发达的种种设施被洪水摧毁，其农耕之地更是常年淹没而无法耕种。这种观点与第四纪地质与海洋地质研究结果基本相符。据地学的综合研究，当时的海平面上涨，比现在高 2—4 米，海侵达到全新世的最大范围，波及渤海湾、黄海、东海西岸及珠江三角洲的大部分地区。而位居黄河中游的中原文化区的受灾程度则小得多。于是，在山东龙山文化、良渚文化衰落之际，河南龙山文化却保持了发展的势头，并发挥了其位居核心易于从各方面吸收有利于本身发展的先进因素的优势，终于走在了社会发展的最前列。现今考古界普遍认为，公元前 1900 年左右，由河南龙山文化发展而来的偃师二里头文化已跨过了文明的门槛。不少学者还认为，二里头文化所代表的时代也就是史籍中所说的夏王朝。《吕氏春秋·离俗览》说：“当禹之时，天下万国。”《左传·哀公七年》也说：“禹会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这是一个全新的历史时期，一个文明的时期。

纵观中国文明的形成历程，我们可以看出，相对于世界其他古文明而言，中国文明是自成一体的；就中国内部而言，中国文明则是起源于多元的。中国史前各文化区的古文化虽有其各自的发展系统，但并非彼此孤立，而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相互激发，形成一个相互作用圈，并最终殊途同归，趋于融合。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文明的起源也是整体性的，而最终发展出光辉灿烂的夏、商、周文明。中国文明之所以独具特色、丰富多彩、连绵不断，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够形成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并在数千年来始终屹立在世界的东方，都与中国文化的传统、中国文明的多元性有密切关系。同世界上其他文明古国的发展模式不同，多元、一统的格局铸造了中华民族经久不衰的生命力。

002

中华民族发展的历史足迹

古人类遗址

人类起源问题是现代科学中的几大谜之一。目前学术界一般认为，人类的发展经过了南方古猿、直立人、早期智人和晚期智人四个阶段，而腊玛古猿是最接近人类的猿型祖先。

中国的腊玛古猿化石地点集中在西南地区的云南省。1956年和1957年，云南开远县小龙潭煤矿发现了腊玛古猿和森林古猿的平齿。1975年，云南禄丰县开始发现古猿化石。除腊玛古猿外，禄丰还发现了另外一类骨骼更为粗壮的西瓦古猿化石。到目前为止，禄丰发现的古猿化石共有：腊玛古猿颅骨3具；西瓦古猿颅骨2具，上、下颌骨碎片50余件，牙齿总数达1000多个。上述古猿生活在距今800万年以前，它们很可能是向人科方向进化的一个代表类型，而禄丰是世界上发现这类古猿化石最丰富的地方。

中国的南方古猿化石尚未确认。1970年出自湖北省建始县洞穴堆积的4枚牙齿，曾被认为属于南方古猿，同时出土的还有大熊猫、步氏巨猿等森林草原形动物化石。由于材料很少，我们还无法了解中国南方古猿的更多情况。

中国是世界上发现直立人及其遗址最多的国家。迄今为止，中国已发展的最早的直立人化石是元谋人。元谋人化石发现于云南省元谋县上那蚌村附近，地处元谋盆地的边缘。化石是两枚属于一位成年人的上中门齿，门齿带有十分明显的原始性质。元谋人生活在距今170万年以前的更新世早期，主要靠狩猎和采集野果为生。他们使用的石器比较小，都是用坚韧的脉石英或石英岩制成的。在元谋人生活过的地层里还发现了大量炭屑，一些专家认为，这说明元谋人已经具有使用火的能力。

位于华北的直立人遗址有蓝田人遗址和北京人遗址。1964年,中国科学工作者在陕西省蓝田县公主岭发现了一位30多岁女性直立人的大部分头盖骨和一部分面骨。蓝田人还保留着许多明显的原始性状,她的眉脊硕大而粗壮,额骨低平,头骨骨壁也很厚,其脑量大约是780毫升。蓝田人大约生活在距今100万至115万年以前的中更新世早期,与蓝田人共生的主要是大熊猫、巨獭、剑齿象等南方森林型动物。蓝田人打制和加工石器的方法以锤击法为主,制成的石器很粗糙。遗址中还发现了一些炭屑和烧骨,这应当是蓝田人用火的遗迹。著名的北京人遗址位于北京市西南约50公里的周口店龙骨山,是一处石灰岩溶洞堆积。北京人从距今60万至50万年以前进入洞中居住,直到距今20万年左右才因洞顶坍塌被迫离开,其间断断续续居住达30万至40万年之久。1929年,中国考古学家裴文中在此发现了第一具完整的北京人头骨,从而震动了世界学术界。时至今日,科学工作者先后共发现了6具完整或比较完整的头骨、12块头骨残片、15块下颌骨、157枚牙齿及多种骨骼的残片,这些化石分属于不同年龄的40多位男女北京人。北京人的形态比蓝田人进步一些,但仍然是面部较短,吻部前伸无下颏,前额低平。他们的平均脑量已达到1088毫升。北京人生活于中更新世的间冰期,以采集、狩猎为主要经济手段。北京人已掌握了锤击法、砸击法、碰砧法三种打击石料的技术,已能制造出比较复杂、精巧的石器。从遗址中的用火遗迹分析,他们已能很好地管理火了。

中国长江流域也是直立人生息的地方。1980年,科学工作者在安徽省和县的龙潭洞发现了和县人遗迹,发现了一位男性青年直立人的头骨及其一些骨骼碎片和牙齿化石。和县人的头骨保存相当完整。其总体形态和北京人比较相像,但具有一些更为进步的特征。研究者认为,和县人是直立人中的进步类型。和县人生存于中更新世,与晚期北京人的时代相当。

在中国东北地区,科学工作者于1978年在辽宁本溪满族自治县发现了庙后山遗址。庙后山人的时代相当于北京人的晚期,属于晚期直立人。庙后山人化石只发现分属老年人和成年人的牙齿两枚及一段幼年人股骨。庙后山人居住在石灰岩山洞里,靠狩猎为生,他们的石器比较先进,用火的本领也较高。庙后山是迄今发现的中国最北部的直立人遗址。

中国早期智人遗址十分丰富,这使得我们对中国早期智人的形体特征、文化面貌、发展系统都有了较多的了解。生活在华北的早期智人有许

家窑人、丁村人、大荔人和新洞人等 其中以大荔人的时代为最早。许家窑遗址位于山西省阳高县许家窑村附近，人类化石有分属 10 多位男女老幼的近完整的头骨、枕骨、上颌骨等 20 多件。许家窑人生活于距今 10 万年左右的晚更新世早期，他们的头骨厚度和北京人差不多，但脑的构造要相对复杂，其吻部也不像北京人那样前突。一些研究者认为，许家窑人是直立人向早期智人过渡的类型。许家窑人制作的石器先进程度令人吃惊，尤其是他们制作的滚圆的石球，其数量之多在世界亦属罕见。许家窑人是狩猎高手，野马是他们捕杀的主要对象。丁村人生活的时代比许家窑人略晚，遗址位于山西省襄汾县丁村。丁村人主要靠狩猎与采集为生，他们制作的石器比许家窑人的石器更为进步，其中最有特色的是大三棱尖状器，器形奇特，制作精良，显示了较高的工艺水平。大荔人遗址位于陕西大荔县的洛河岸边。1978 年出土的大荔人化石是一位不足 30 岁的男性头骨，脑量达 1120 毫升，其形态介于直立人与早期智人之间，属于早期智人的古老类型。有人根据大荔人头骨形态及其制造石器的方法推测，大荔人可能是北京人的后裔和现代黄种人的直系祖先。新洞人在北京周口店龙骨山的石灰岩山洞中居住。新洞遗址还发现了两件我国最早的磨制骨片，这代表了磨制工艺技术的开端。

生活在我国长江流域的早期智人有长阳人，化石是 1957 年在湖北省长阳土家族自治县西南一个被称为“龙洞”的石灰岩洞穴中发现的。

早期智人的踪迹还出现在东北、西南和东南地区。位于辽宁省喀喇沁左旗大凌河右岸的鸽子洞是中国最北部的早期智人遗址。鸽子洞人化石是一枚小孩的臼齿。遗址中还发现了大量的石器、木炭及动物化石。鸽子洞人的石器继承了北京人的文化传统，又有了长足的发展。辽宁省营口市金牛山遗址发现于 1984 年。金牛山人化石是属于一位刚成年男性的 50 多件骨骼，包括一具完整的头骨和部分脊椎骨、肋骨、髌骨、尺骨、腕骨等等这是中国迄今发现的最完整的早期智人化石。生活在西南地区的早期智人有桐梓人，化石是两枚牙齿，发现于贵州桐梓县石灰岩洞内。洞中还发现了 10 多件石器和一些炭屑及动物化石。马坝人生活在东南地区，化石为一位中年男性头骨的颅顶部分，是 1958 年在广东曲江县狮子山的石灰岩溶洞中发现的。马坝人既具有与直立人类似的原始成分，又具有智人的进步性质，因此代表了直立人转变为早期智人的重要环节。

晚期智人生活在距今 4 万至 1 万多年之间的更新世晚期，他们的相貌和体态已与现代人基本相同。晚期智人的足迹遍布中国，他们的文化则

呈现出多种风格和特色。中国最北部的晚期智人遗址位于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附近的阎家岗。阎家岗人主要以木棒作为狩猎武器，野牛是其主要猎物，他们还用兽骨垒成半圆形的堡垒作为狩猎和暂时生活的营地，这种营地在中国旧石器考古发现中还是孤例。

在黄河流域，晚期智人遗址有著名的萨拉乌苏、峙峪和山顶洞。萨拉乌苏遗址位于黄河支流无定河岸，古人类化石主要为顶骨与股骨。萨拉乌苏人以狩猎作为谋生的主要手段，他们打制的石器小巧精致，其文化明显带有北京人文化和许家窑人文化的特点。比萨拉乌苏人稍晚的峙峪人生活在桑干河上游的峙峪河边，他们制作的石器也是小型的，与萨拉乌苏文化的风格一脉相承。峙峪人已掌握了把石器和木质或骨质工具结合在一起，制成复合工具的技术。遗址中还发现了目前中国最早的石箭头。山顶洞人是继北京人和新洞人之后，在北京周口店龙骨山石灰岩洞中居住的“第三代”人。山顶洞人的脑量已达 1300—1500 毫升，其头骨带有明显的蒙古人种的特征。山顶洞人以狩猎、采集、捕鱼为生，他们已学会用骨针缝制兽皮衣服，还学会了将兽牙、蚌壳、小石珠穿孔系成装饰品。山顶洞人还有将死者身上洒红色的赤铁矿粉并予以埋葬的习俗，这说明他们已有了原始的宗教信仰。

生活在我国西南地区的晚期智人有广西的柳江人、云南的丽江人、四川的资阳人等等。其中柳江人的化石丰富，时代也相对要早。一些研究者认为，柳江人代表了蒙古人种的一种早期类型，是中国以至东亚迄今所发现的最早的晚期智人。丽江人头骨形态和现代人十分相似，具有明显的蒙古人种的特征。已发现的丽江人的遗物有包括石球在内的一批石器和一段有钻孔痕迹的鹿角。资阳人化石是一位老年女性的较完整的头骨，基本特征和现代人相似，但也有一些较原始的性质。资阳人的遗物仅发现一件骨锥，其生活和文化面貌还不清楚。

中国晚期智人的生活区域向南已抵达与亚洲大陆隔海相望的台湾岛。研究者认为，生活在那里的晚期智人左镇人是在更新世晚期冰期的低海面时期越过冰冻的海峡登上岛屿的。在中国西南端寒冷缺氧的青藏高原，虽然尚未发现古人类化石，但也发现了晚期智人的文化遗物。

纵观中国的古人类遗址，数量众多，材料丰富，几乎每一个人类发展阶段都有代表。难怪一位外国古人类学家参观了中国的古人类研究机构后赞叹道，中国很可能会成为全世界古人类研究的中心。

003

中华文明的来源之一

长江文明

长江流域是中华文明的发源地之一。它存在三个主要的文化区域，其文化和文明因素，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位于长江上游的四川川江平原，气候宜人，物产丰富。由于四川盆地四周都是高山峻岭，交通极为不便，基本上是一个封闭的环境，与中原阻隔，故古文献中对四川曾经存在过的古国记载极少。除了商代的甲骨文多次提到蜀国可能是指四川的古国外，《尚书》中也记载了周武王伐纣的八个盟国之有蜀国。

1986年夏，在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发现了两个距今3000多年的祭祀坑。坑内出土大量象牙、铜器、金器和玉器，其中仅青铜人面具就大大小小达几十个，最大的一个高近1米。出土的青铜人像有的还戴着金面罩。尤其是2号祭祀坑内出土的一尊青铜人立像，身着左衽长袍，头戴冠，人像高1.72米，连座高2.62米，是我国古代青铜艺术的杰作。

祭祀坑中还出土一支金杖，空心，可分为上下两部分。下部有一圆形人面图形，头戴五角冠；上部四面各有一只水鸟，两两相背，长喙向下衔着一条鱼，使人不由得想到鱼鳧国王的传说。距金杖头端约20厘米处，出土一个龙头形铜饰件，应是金杖杖首。铜人像、铜面具、龙头金杖以及玉琮、玉璋，无疑均与王权和祭祀有关。说明这里曾经存在以往鲜为人所知的发达的青铜文明是毫无疑问的。根据这一青铜文明独特的文化面貌及所处的地理位置来看，这应当是古蜀国的遗存。

长江流出三峡之后，即进入了湖北省境。在这里，长江与其最大的支流汉江汇合，冲积成江汉平原。

江汉地区文明的形成时间比中原等地区稍晚，而且与中原华夏文明

的影响有关。但是，江汉地区古代文化的直接继承者，商晚期时在这一带建立了楚国，对中华文明的形成和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甚至有人认为，秦的天下有一半是楚统一的。

长江下游的太湖，古称震泽、具区。人类很早就开发了太湖流域（包括宁绍平原），距今 7000 年前，河姆渡的先民们就在这里劳动生息，他们用骨耜种植水稻，建造干栏式房屋，烧造夹炭黑陶器，并且有用象牙和玉雕制的装饰品。差不多同时，另一支文化——马家浜文化在河姆渡文化的北方发展起来，并很快扩散到太湖南北东三面。最迟到距今 6000 年前，马家浜文化已有籼稻和粳稻两种水稻，约 6000 年前，已有用野生葛织成的纬线起花罗纹布，有玉制装饰品玦、环等。

马家浜文化的继承者是崧泽文化。崧泽文化时期农业和手工业都有很大的进展，耕地已应用了石犁，虽然还不普遍。玉器璜、玦、环、玉蜀等数量显著增多，经检测，玉质多为阳起石——透闪石系统的软玉，从目前的材料来看，这不仅在中国，而且在上世界上也是最早的。陶器多用轮制，器型更加规整。根据已出现男女合葬的现象，人们推测崧泽文化已进入父系氏族社会。

在距今约 5300 年前，良渚文化在崧泽文化的基础上发展起来，延续了约 1000 年。良渚文化是 1936 年在浙江省余杭县良渚乡发现的。在中国文明起源时期诸考古文化中，它是最发达的文化之一。

农业是良渚文化得以存在的基础。良渚文化的先民们在大田中种植籼稻和粳稻，在园圃中种植葫芦、甜瓜、蚕豆以及桑树、苎麻等菜蔬果木。考古发现的大量石犁、石耘田器以及钱山漾出土的干葶，说明当时已广泛采用了犁耕技术，并利用耘田器进行中耕，利用干葶沤河泥作为肥料。大量的水井和早在马家浜文化晚期已发明的小型水渠，可以对农田进行灌溉，是当时的水利工程。这些先进技术大大提高了农田的产量，一个人生产的粮食，已超过维持自身的需要。

根据调查情况，良渚文化遗址的分布密集度大大超过早期的崧泽文化和马家浜文化。在浙北地区，良渚文化遗址常常是几个、几十个集中在一起，仅浙江余杭县的良渚、安溪、长命、北湖四个乡的一部分范围内，就发现了良渚文化遗址 40~50 处，成串成片，形成遗址群的现象。这样数量较多而且密集的人口，当然要依赖农业提供的粮食才能存活。他们之中还有一定数量的人是脱离或半脱离农业生产的，包括显贵、中上层至覿和手工业者。

良渚文化的手工业存在相当多的门类，主要有石器制造、制陶、纺织、竹木器制造、玉器制造等。有些手工业已完全从农业中分离出来，成为独立手工业。

陶器制造业是手工业重要生产部门。良渚文化的陶器以泥质黑皮陶最具特色，日常用具主要是灰陶。已普遍采用快轮生产，器形规整，器壁均匀。主要器种有鼎、豆、壶、盆、盘、觥、鬶、尊、簋、杯等。

纺织物主要是绢和麻布。绢片经纬线每平方厘米各为 42 根左右，采用先缫后织的家蚕丝织成。麻布为平纹苧麻布，每平方厘米经纬线为 24 根，有的经线 30 根、纬线 20 根，其细密程度与今天的细麻布相似。这是我国目前所见最早的苧麻织物。

石、骨、竹、木器的制造在这一地区也有悠久的传统。生产工具主要是石器和木、骨器。生活用具除陶器外，大量的竹编器物，如竹篾、竹席等，还有捕鱼用的“倒梢”。

在诸种手工业中，以玉器制造业最为发达。从发现的大量玉器来看，良渚玉工技术极为精湛，采用了锯、割、凿、磨、钻、雕、刻等多种工艺手段，并且可能已利用了碾玉砣。玉料以阳起石——透闪石系统的软玉为主，种类主要有琮、钺、璧、璜、珮、锥形器、玉 D 形器等，以玉琮和玉钺的制作最为精致。

从制陶、制玉等手工业来看，良渚文化的部分手工业与农业已完成了分工。

以发达的农业和手工业为基础，良渚文化在许多方面已出现了文明的因素。

良渚文化时期，阶级已经确立，良渚文化中晚期的墓葬证实了这一点。已发现的良渚大墓大都建在人工堆筑的土山顶上，排列有序，形成专门的墓地。如反山、瑶山、福泉山、张陵山、东山、西山等都是人工堆筑而成，其中反山的土方量现存达 2 万立方米，福泉山达 1.3 万立方米。福泉山顶发现有由一尺见方的红烧土砖块垒砌的台地，面积约 100 多平方米，四周是良渚大墓，很可能是当时人们祭祀用的台地。瑶山也发现有高台存在，良渚大墓建在台上，而且越近台中心的墓葬随葬品越丰富。这些大墓随葬大量玉器和陶器。福泉山的一座墓葬随葬品为 170 件，其中玉器达 40 件，其他 30 件也都是精美的陶器。反山 14 号墓随葬品多达 260 件（组），基本上是玉器。这些大墓大都随葬代表神权的玉琮，代表杀伐之权

的玉钺以及大量的玉璧。墓内葬具有木棺，有的可能还有木椁，反山 11 座大墓塘底都有土台作为棺床。张陵山等地良渚大墓中还发现有殉人、殉狗的现象。

与大墓形成鲜明对照的是那些小墓。良渚文化中后期的小墓没有任何葬具，有的随葬一两件日用陶器和石制工具，有的一无所所有。这些小墓面积仅可容身 散布在居住区内外 没有任何规律 个别的两两并列 可见已不存在氏族墓地。从这点来看，可能当时血缘关系的纽带已经松弛，地缘关系已代替或部分代替了血缘关系。

良渚文化的先民有着相同的宗教，这一点可以从玉琮的情况清楚地反映出来。一般认为，琮是一种用于宗教活动的法器或礼器，是人与鬼神交通的工具，是良渚文化数量众多，最具特色的典型器物。琮有一节与多节之分，每节必定刻精粗不等的兽石纹，这些兽石纹无论怎样变化，基本结构却都完全一样，即上面两只圆圈作为眼睛，下面一道横凸带作为嘴巴。这种兽石纹是良渚文化的特有纹饰，除玉琮上存在之外，在玉锥形器、玉璜、玉 D 形器、玉带钩以及个别陶器上也有。

当太湖流域 3 万平方公里范围内的良渚文化的先民们，都以相同形状的玉琮作为法器或礼器，并且在所有的玉琮上都刻着构图相同的神秘的兽石纹时，他们的宗教思想当然不会是一样。这种宗教思想基本上与良渚文化相始终，延续了大约 1000 年之久。

良渚文化时期，已存在一个专门与神打交道的阶层，即巫觋阶层。他们有主持宗教活动、与神沟通、传达神意等权力。正是由于他们的师承授受，才得以使良渚宗教，包括宗教法器玉琮和琮上的兽石纹流传千年之久，并在以后对商周文明产生影响。

还应该提到的是，良渚文化可能已有简单的文字。迄今已发现刻在陶器上的文字符号 7 个，这些文字符号已超过图画文字的阶段，结构笔画都很接近甲骨文。其中一例是 4 个不同个体刻在一件陶器上，可能已能表达一定的意思。

到目前为止，在良渚文化遗址中还没有发现金属的迹象。但也有人认为 良渚玉器上直径仅 2~4 毫米的小圆圈（兽面纹的眼睛）可能是用金属管蘸解玉砂钻磨成的。

良渚文化是当时最先进的文化之一，它的影响几乎及于半个中国。在山东大汶口文化、山西陶寺文化、湖北屈家岭文化、广东石峡文化中都可以看到良渚文化因素的存在。然而，令人惊异的是，距今约 4200 年前 正

当中原夏王朝的初期，良渚文化忽然衰亡了。在太湖流域取代良渚文化的马桥四层文化，很少继承良渚文化的传统。良渚文化最具特色的玉器，基本上在太湖流域消失了。

良渚文化虽然意外地衰亡了，但它在中华文明形成时期的影响和作用，却是除了黄河中下游地区的华夏、东夷文化以外，其他任何地区的古代文化无法比拟的。中国最早的 3 个奴隶制王朝夏、商、周都吸收继承了这一文化的许多因素。

004

中华文明的来源之二

黄河文化

以中原地区为核心的黄河流域远古文化，自身经历了长期的发展演变，同时充分吸收周围地区的文化精华，最终诞生了以夏商青铜文化为代表的早期文明。

约自公元前 5000 年起，黄河流域以老官台、大地湾文化为先导，发展成为仰韶文化。它分布地域广阔，主要是在关中、晋南、冀南和河南的大部，四外遍及甘青交界、河套、冀北、豫东和鄂西北一带。前后经历 2000 年至公元前 3000 年结束。在已发掘的仰韶文化早期的代表性遗址陕西临潼姜寨，聚落布局完整，分为居住区、烧陶窑场和墓地三部分。整个村落可能居住着若干氏族组成的一个胞族或一个较小的部落，反映出氏族血缘纽带的牢固和氏族组织的健全。仰韶文化流行半地穴式方形、长方形单间房子，面积 120 平方米，在穴壁、居住面上，普遍涂抹草拌泥，或再涂料姜石的白灰面，有些还经烧烤，使之坚硬光滑。同时，早期已有少数地面建筑，较进步的一种是先挖墙基槽，立柱填土，再用草拌泥垒筑起墙体。晚期的地面建筑中，出现异常讲究的大型房子和较复杂的连间、套间式房子。秦安大地湾 901 号房子，长方形主室室内前墙开设一个正门和两个旁门，还紧连有东、西侧室和北面的后室，整个房址占地面积 290 多平方米。前墙外约 130 平方米范围内，另分布三排整齐的柱洞和明础石，用以搭盖大棚。这座宏大建筑无疑是公众活动的重要场所，或可称之为“部落会堂”。

仰韶文化农作物仍以粟为主，个别地方还发现黍和稻。石铲有所改进，晚期出现双肩长方的形式。收割工具代之以两侧打缺口的陶刀、石刀和磨制的穿孔石刀。饲养家畜除大量的猪、狗外，已经养羊，但不多也不普遍。制陶工艺相当成熟，晚期始用一个成形的快轮术制作部分陶器，这是

陶业生产的重大进步。在彩陶风行全国之时，仰韶彩陶独树一帜，在红陶器上习用墨、紫、赭彩勾画几何形及鱼、蛙、鹿、人面、花卉等图案花纹。

仰韶文化居民死者按一定葬俗被埋在本氏族墓地，从中也可窥见部分的社会现实生活。在早期阶段，主要有单人仰身直肢一次葬墓和男女老幼多人二次合葬墓，后者被认为是本氏族内血缘关系更为密切的母系家族成员死者，他们的尸骨被收集到一起再进行第二次埋葬。还有少数同性合葬墓，可能是母系氏族社会所特有的一种葬俗。随葬品多属一些陶器，总的看来不存在贫富分化、贵贱有别的现象。到晚期阶段，如在荥阳青台遗址，新发现了一对成年男女的一次合葬墓，显示出原始社会居民世系和婚姻的变化，由母系氏族女方居住的对偶婚变为父系氏族的一夫一妻制个体婚。

约在公元前 2600 年以后，仰韶文化分别演变为中原龙山文化和陕西龙山文化，下限不晚于公元前 1900 年。

龙山时期的聚落一般较大，有些地点建起了土、石城堡。河南登封王城岗发现东西相连、先后夯筑的两座土城堡。老城、东城废弃后，其西墙即成为新城、西城的东墙。西城的西墙基长 92 米，南墙基长 80 多米，城内发现夯土建筑遗存奠基坑，有的坑内的夯土层间填埋一些成人和儿童的骨架。此外，河南睢阳平粮台、河套地区的阿善、西园东台地、莎木佳、黑麻板、凉城老虎山等，都发现石砌围墙构成的城堡遗迹。这些工程较大的城堡，尚未具备初期城市的规模，主要体现了城的特殊防御的功能，是社会群体间斗争剧烈的产物，也是人们重要聚居地由村落向城邑过渡的征兆。在河南汤阴白营、安阳后冈、临汝煤山、陕西临潼康家等地，各发现有数十座房址。白营的房子成行成排分布，布局最为规整，不见位居中心的大型房子，多属适于个体小家庭生活的小型住房。陕西龙山文化一般沿用半地穴式房子，多为方形、长方形的单室，同时新兴起以过道相连的“吕”字形里外间双室房子。

农业工具主要有石铲、骨铲、蚌铲、穿孔石刀、石镰、齿刃蚌镰等。陕西庙底沟和襄汾陶寺都发现双齿木耒的印痕，说明了农业生产的发展。龙山时期饲养牛、羊有所增加，马大约已进入家畜的行列。至此，猪、狗、牛、羊、马、鸡六畜基本齐全。

铜器的产生和发展，标志着生产领域的重大进步。中原龙山文化铜器增多起来，发现于临汝煤山、睢阳平粮台、登封王城岗、郑州牛砦和董砦、襄汾陶寺等地，实物包括青铜容器碎片、残铜片、红铜铃、炼铜坩埚残件、

炼铜渣等。这些铜器代表了当时一种新兴工艺和生产力的先进成分，它是原始社会向文明社会迈进的物质基础。

黄河流域具有较高工艺水平的早期木、漆器，集中见于中原龙山文化的陶寺遗址。原物都已朽烂，仅从大量的朽木痕迹中剔取和复原出了数十件标本，主要有家具和炊厨用具长方形案、圆面“几”、俎、匣、盛器和饮食器平盘（托盘）、盆形盘、勺、觚、杯，以及大型乐器、鼗鼓等。分别使用了枋木挖凿、板材拼接、卯榫插合等方法。器表多施彩绘或涂漆，以红色为主，兼用黄、白、蓝、黑、绿等颜料，描绘条带纹、几何形纹、云纹、回纹等图案。陶寺龙山文化的彩绘木器和漆器，开中原地区商周漆器工艺传统之先河。

随着物质生产的高涨，精神文化方面也增添了崭新的内容。在陶寺发现了石磬、鼗鼓、龙盘等不寻常的物品，它们都只是为数甚少的几个大墓主人才能拥有。彩绘蟠龙纹陶盘画面庄重神秘，当是以蟠龙图像为族徽的陶寺先民的一种重要祭器。龙山阶段占卜已有一定制度，各地普遍发现有卜骨，巫覡通过烧灼猪、牛、羊、鹿的肩胛骨，观察其兆文，以释凶吉、定行止。

中原龙山的墓葬、乱葬坑和奠基人牲等遗迹，突出地显示了社会的贫富分化、等级对立以至阶级压迫的情况。陶寺墓地最具代表性。已发掘墓葬 1000 余座，其中大型墓仅 9 座，墓主均属男性，使用木棺，棺内撒朱砂，随葬品达一二百件，有彩绘陶器、彩绘木漆器、玉或石制的礼器和装饰品，以及整猪骨架等。在属于大型墓的专有品中，尤以龙盘、鼗鼓、土鼓、石磬最为重要。大多数小型墓，墓坑窄小，大多既无木质葬具，又无任何器物。其他为中型墓，墓主多系男性，仅分布在大型墓两侧者为女性，也使用木棺，随葬一些器物和猪下颌骨。由此窥见，执掌大权的极少数首领人物，独占有表示其社会地位的重要礼器，私有财产十分丰富，而广大成员处于贫困的境地。在西安客省庄、洛阳王湾、邯郸涧沟等地发现有乱葬坑，多具人骨架置于废坑之中，凌乱叠压，或身首分离，或作挣扎状，也有的人畜同埋。这些非正常死亡的人中间，有一部分可能是惨遭杀戮的俘虏、沦为祭祀的人牲。纵观中原龙山文化的种种考古发现，无不说明社会处于大变化的关键时期，有的认为是属于原始社会军事民主制阶段，也有的认为已进入阶级社会，国家或国家雏形已经产生。

黄河下游海岱地区的新石器文化自成系统，序列清楚，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前 4300—前 2500）、山东龙山文化（前 2500—前 2000）三者一

脉相承。

大汶口文化的社会经济，同黄河流域其他新石器文化一样，也以粟作为农业基础。猪、狗、牛（黄牛、水牛）、鸡可能还有猫都已家养。制陶工艺跻身于同时期制陶业的先进行列，彩陶数量虽少但特点鲜明，中、晚期有接近瓷土成分的白陶和薄胎黑陶，无论陶质、造型和火候，最能显示其突出成就，在以后的山东龙山文化中还得到进一步发展。骨雕工艺也颇多创新，有透雕对称图案的十七齿象牙梳，透雕花瓣纹的象牙筒，镶嵌绿松石的骨雕筒。其他还有刻纹骨匕、骨珠等。这些牙雕和镶嵌工艺品在我国新石器时代诸文化中都富有代表性。

大汶口文化的社会结构，随着经济的发展而有变化，这从葬俗上反映出来。早期墓葬间的随葬品无悬殊，与仰韶文化早期相似，也曾一度流行多人二次合葬习俗，中、晚期阶段，从墓葬显露出了社会上存在的贫富分化。大汶口墓地 10 号墓 墓坑很大 有椁有棺 墓主为一老年女性 随葬陶器一项即达 90 多件，有象牙梳、象牙雕筒和骨雕筒共 4 件，玉铲、玉臂环和玉指环各 1 件，石片头饰、石珠颈饰和绿松石片胸饰各一串，合计 77 件。与此相对照的，有些狭小的墓坑内死者孑然一身而无任何器物。这时还出现成年男女两人合葬墓，同样是父权制确立后的现象。

值得注意的是，在山东莒县陵阳河和大朱村、诸城前寨三地大汶口文化晚期的大陶尊上，发现刻有七八种图像近 20 件标本 所用陶器单一 图像结构定型而远比仰韶文化、马家窑文化的符号复杂。其中，有的被释为‘烜’（简体为‘旦’）‘𣎵’（繁体为‘𣎵’）‘斤’‘凡’等字。有的意见认为这些图像已属意符文字，或者至少是最接近文字的祖型。同时，可以知道陵阳河的大汶口文化居民依山头现象纪历 并进行春祭（烜）和夏祭（𣎵）那些陶尊便是盛放供品祭祀的礼器。

山东龙山文化在较高的基础上起步向前发展，此时也出现城堡。制陶业处于鼎盛时期，普遍使用快轮成形，尤以蛋壳黑陶盘口高柄杯的制作技艺最为高超。冶铜业兴起。玉器工艺较大汶口文化有所进步。我国的琢玉传统，最初是从近海地区的良渚新石器文化中产生、扩展开的，而山东龙山文化玉器工艺是我国玉器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山东龙山文化当正处于原始社会崩溃的时期，有人提出或有可能进入了阶级社会。

黄河上游甘青地区，目前大量发现的是马家窑文化（前 3000—前 4000）和齐家文化（前 2000 年—？）遗存。

一般说来，马家窑文化的早期墓葬中，随葬品数量和质量不算悬殊。